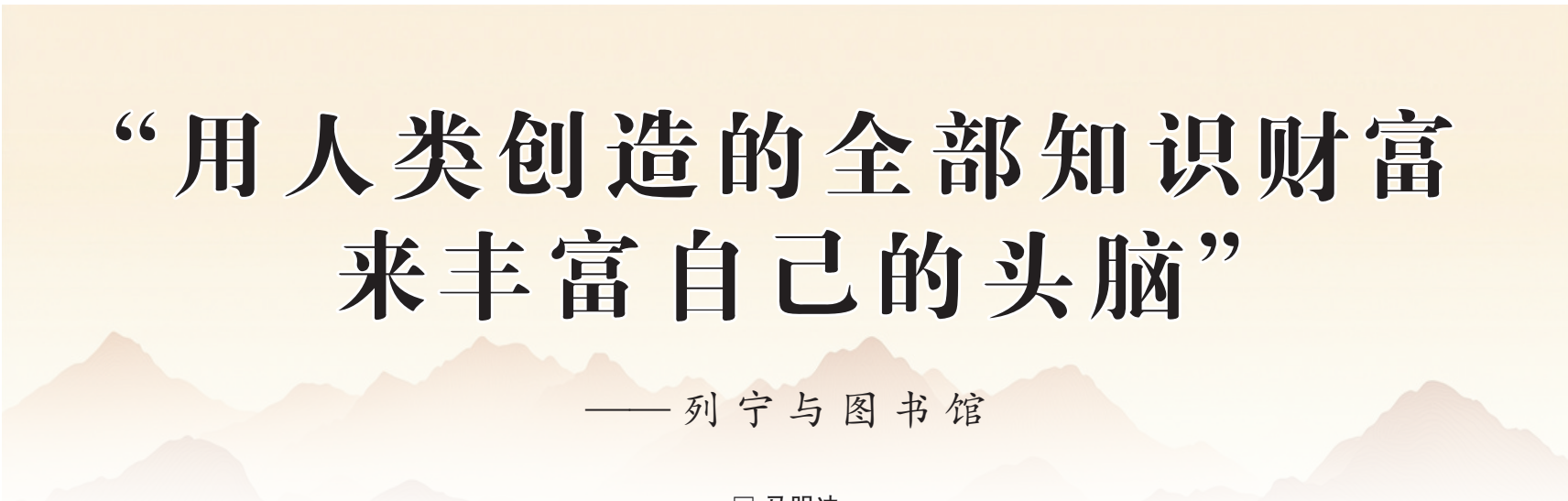


列宁曾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正是对这句箴言最鲜活的诠释。从青年时代的求知若渴，到流亡岁月的理论淬炼，从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再到国家建设的宏观布局，他总是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到图书馆博览群书、探骊索隐，研精覃思、笔耕不辍。可以说，图书馆成为列宁探索真理、构建理论体系的精神殿堂和革命工具，为其成长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 图书馆里的思想觉醒之路

1870年4月，列宁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市（今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其父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曾担任国民教育总监；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小学教员。列宁五岁就跟母亲学习读书，父亲常从图书馆借阅少儿读物供其阅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使得列宁自幼便对阅读产生了浓厚兴趣。入中学后，为了获得丰富的知识，列宁充分利用家乡卡拉姆津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资源，广泛查阅并系统整理有用资料，同时做了大量摘录和笔记。与他同桌数年的同学回忆道：“他写作文时总是很细心的，常常从当时的卡拉姆津图书馆借来的书中作摘录。”

1887年，列宁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除完成规定的课程外，他积极利用一切时间，在喀山大学的图书馆刻苦读书和从事研究工作。因参与学生运动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喀山大学开除后，他并未停止求知，反而将图书馆变为新的课堂。在亲属的帮助下，他得到从喀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和杂志，进行广泛阅读。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为列宁打开了理解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本质的大门，并在其心底深深埋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1889年迁居到萨马拉后，他继续利用图书馆开展学习研究。在萨马拉公共图书馆，列宁深入研究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以及当时俄国和欧洲的书籍资料，并逐渐成长



——列宁与图书馆

□ 马明冲

为富有深刻而全面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圣彼得堡后，他向自由经济学会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借阅了大批所需图书，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 图书馆构筑的理论阵地

1895年，因领导圣彼得堡工人运动，列宁再次被捕入狱。虽身陷囹圄，但他未曾停止过阅读。不仅积极利用监狱里的图书馆，还设法让姐姐安娜·伊利尼奇娜从监狱外的图书馆为自己借书和送书。监禁期间，列宁目不窥园、手不释卷，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曾参考了五百八十三本书，书中大量引用图书馆的档案、资料，成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和解决俄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光辉典范。1897年2月，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临出发前，他还利用被允许看望母亲的三天时间到鲁勉采夫博物馆图书馆搜集了许多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材料。流放途中，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他每天来回要走五俄里到尤金图书馆搜集、查阅、摘录各种文献资料。此外，列宁还常到市立图书馆翻阅各种杂志和报纸。流放至舒申斯克村后，他在与家人的通信中，仍竭力设法借阅莫斯科各个图书馆的图书。

侨居国外期间，列宁靠掌握的几种外语，在欧洲图书馆做了许多研究



列宁图书馆（今俄罗斯国立图书馆）

工作。1902年，他在当时世界上藏书最丰富、设备最完善的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深入研究伦敦的资本主义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状况，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研读让他完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纲领——《怎么办？》的最终版本。1907年至1917年，列宁先后侨居德国、法国、瑞士等国。在日内瓦、伯尔尼、苏黎世、巴黎等城市的图书馆，列宁系统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国际工人运动史，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理论著作。1908年，在日内瓦

的“读者协会”图书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等地，列宁写下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哲学著作的部分章节。

在瑞士苏黎世期间，列宁每天都在图书馆度过。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1916年秋天和1917年初，伊里奇集中全副精力从事理论工作。他尽量利用图书馆开放的时间。他每天正九点到图书馆，一直坐到十二点，十二点十分正回到家里（十二点至一点图书馆停止开放），午饭后再到图书馆去，一直坐到下午六点。”在

这里，列宁阅读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等大量书刊，翻阅了从英、法、俄、德、奥等国来的大量报刊，最终完成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同时，列宁还精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翻阅了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书籍，并将材料汇集成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后在此基础上写下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代表作。该书对革命与国家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为十月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列宁“不论是对图书馆构造本身，还是对图书馆规定的各种制度、简报、借阅办法、检查制度、收藏制度、图书整理，卡片格式、编目简报，等等无不感到极大兴趣”。

## 图书馆与国家治理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将图书馆从理论源泉升级为国家战略工具。他对沙皇政府时期图书馆只对学者、教授和其他专家开放，而限制书籍在平民之间流传的做法表示愤慨，提出：“衡量教育工作是否安排得合理，要看有多少书被读者借回家去，要看为多数居民提供了什么方便条件。”为普及知识、提高全民文化水平，列宁提出

了社会利用图书馆的主要原则和建立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任务，要求有关部门“利用现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组织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们现有的每一本书”。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掀起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人民委员会相继颁布了《保护图书馆及其藏书的管理条例》《图书馆、书库和所有藏书的征用办法》《关于集中管理图书馆工作》等条例规定，各种集中化图书馆系统相继建立，馆际借阅系统与工农阅览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图书俱乐部和图书馆网络。到列宁逝世时，苏联已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图书馆网络，甚至在每一个乡村都建立起阅览室。

尽管这一时期公务缠身，列宁仍坚持在繁忙间隙利用图书馆资源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学说。例如，列宁写的那张希望得到在德国出版的图书书单就是一个实例，其内容涉及“一、有关下列不同政治派别的各个政党及会议的小册子和记录：（1）共产党人，（2）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3）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4）独立工人政党（左翼的和右翼的）。二、《光明社》派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和平主义的和批判性的作品，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评价、结论等等。三、现代经济：战争的结果，经济恢复工作，工农业等方面的战后任务（特别是小册子、书和记录）。四、预订几份给共产国际，给四至六所大学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及其他单位《红旗》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汉堡人民报》各个方面的新书目录诸如此类”。

从图书馆到历史舞台，列宁用其伟大的一生证明了思想的重量足以撼动人类的文明进程。在知识殿堂的阶梯上，他完成了从读者到革命家、从理论家到战略家的多重飞跃，最终让思想本身成为改变世界的最大物质力量——这恰是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生动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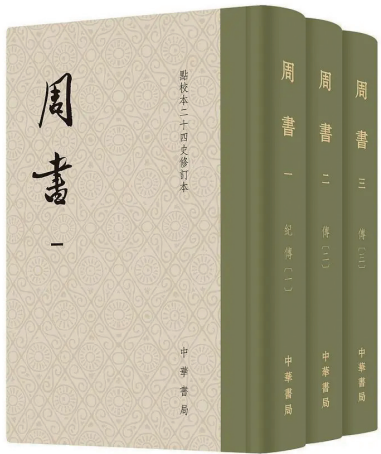
（作者系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 《周书》中的关陇雄风

北周如何奠基隋唐盛世

□ 刘安志



《周书》又名《后周书》，是唐代令狐德棻主持编纂，岑文本、崔仁师等参与修撰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的是从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到581年杨坚代周建隋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史。

## 承上启下的历史枢纽

北周虽国祚短暂，却在政治制度、军事体系、文化融合等方面深刻影响着隋唐格局，是连接南北朝与隋唐的核心枢纽。

北周统一进程奠定了隋唐大一统基础。西魏初期仅控制关陇地区，后期通过吞并后梁占据益州，疆域拓展至今四川、山西、湖北等地。577年，周武帝灭掉北齐，不仅统一了北方，更整合出一套强大的军事行政体系。隋朝继承北周疆域与实力后完成全国统一。

西魏北周制度改革构建隋唐政治军事体系框架。《周书·文帝纪下》记载：西魏初期受东魏高欢军事威胁，高氏凭借强大军力频繁入侵边境，意图吞并。面对关中多民族杂居的复杂局面，宇文泰推行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揭示，这项政策通过融合胡汉各族，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治集团。八柱国统辖二十四军的府兵制架构，不仅

是隋唐军制的渊源，更催生出影响深远的关陇集团。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述，周、隋、唐三代统治者皆出自武川军镇，这种军政集团的延续性成为理解隋唐政治结构的关键。

西魏北周继承北魏历史遗产推动南北文化融合。西晋灭亡后，江左延续汉魏衣冠礼乐，北方则由鲜卑拓跋氏完成统一。北魏政权混合汉制与北族习俗，“为中原文化注入塞外精悍血液”，西魏北周将之整合为系统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文化认同的深度整合，为隋唐实现“华戎同轨”的文明气象奠定基础。

深入理解西魏北周的历史枢纽作用，《周书》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周书》作为核心史料，勾勒出西魏北周典章制度的发展脉络。卷二《文帝纪下》详录554年“改置州郡及县”的行政改革，成为研究地理沿革的关键文献；卷一六记载西魏二十四军的府兵结构，为理解早期府兵制提供基础；卷二四《卢辩传》梳理西魏北周官制，反映其虽仿《周礼》实则兼用秦汉旧制的特点；卷二三《苏绰传》完整收录“六条诏书”，揭示西魏北周政治纲领。

不仅局限于政权内部，也广泛记录周边动态，是《周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天下分裂，《周书》将东魏、北齐、梁陈兴衰进行了详尽的记载，使读者对时局一目了然。卷四八为后梁三代君主及重臣立传，卷四九、五〇《异域传》首次系统记载突厥、稽胡历史，保存了珍贵的民族史料。这种书写方式打破东西魏对峙、兼记南北政权，突出了北周“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

《周书》摒弃程式化文书，注重原始资料。卷一一《宇文护传》收录宇文护母子书信，成为研究中古社会史的重要素材。卷三一《韦孝宽传》记载“平齐三策”，主要研究论述北周的地缘战略。卷四一《庾信传》全文收录《哀江南赋》，此为南北朝文学研究提供了经典文本。

作为记录西魏北周最原始的史籍，《周书》通过典章制度、政权互动、文献辑录等多维度的呈现，不仅让读者对西魏北周的历史全貌一目了然，

也通过独特的编纂视角，对制度沿革、地缘战略与文化整合的深层脉络进行了有机融合。

## 北周遗产的隋唐转化

隋唐政权通过继承北周政治遗产确立自身正统性，这一过程深刻体现在《周书》的编纂中。唐初编撰《周书》的重要目的，是宣扬李唐先祖功业，构建“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的法统链条。要实现这一目标，需通过史书的编撰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确立西魏北周作为北魏继承者的正统地位；二是论证关陇政权向隋唐大一统王朝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北周正统性来源，首要问题涉及北魏分裂后的继承权之争。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高欢与宇文泰各自拥立北魏宗室，均以拓跋政权继承者自居。北齐天保二年编撰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隋文帝为适应政治需求，命魏澹重修《魏史》，确立“西魏为真，东魏为伪”的基调。《史通》记载此次修史“文恭列纪，孝靖称传”，从国家层面承认西魏合法性。唐初修史时，《周书》延续这一脉络，《周书·文帝纪》虽主要记述宇文泰功业，但始终使用西魏年号，通过串联北魏、西魏、北周谱系，构建完整的法统体系。相比较而言，《北齐书》仅在北齐建国历史中追溯北周末年及东魏史事，缺乏正统建构的主动性。

探讨隋唐承接北周的历史脉络时，令狐德棻刻意采用了多种叙述方式，从政治合法性、制度渊源、历史记忆等多重角度展开阐释。令狐德棻在奏疏中明确强调李唐“复承周氏历数”，但北周并非统一政权，需通过历史书写强化其宗主地位。故而《周书》不仅记录西魏北周史事，还系统记载东魏北齐、梁陈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动态。如卷四八为后梁三代君主立传，卷四九、五〇《异域传》详述对外交往，这种“天下共主”的书写模式，与《北齐书》局限于区域政权的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使读者在字里行间自然形成北周疆域“包举宇内”的观念认知，从而成功塑造北周作为正统宗主国的形象，为隋唐继承

其政治遗产铺平了道路。

此外，《周书》的编纂也深受唐初门阀政治影响。唐太宗命高士廉编《氏族志》时强调，只按照目前的官职爵位高低来确定等级。这一原则直接服务于“崇重今朝冠冕”的政治目标。令狐德棻同时参与《周书》与《氏族志》编修，在《周书》中特设“八柱国家”传记，直言“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这种书写既照顾了现实的政治需求，又通过追溯关陇集团的源流，充分构建了李唐与西魏北周的历史承袭关系。

通过以上编纂方式，《周书》成功地将北周这个割据政权转化为承袭启隋的关键枢纽。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不仅确立了西魏北周的正统性，更通过谱系建构与门阀追溯等，为李唐政权提供了更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 东西对峙的实力逆转

高欢和宇文泰均出身北魏边镇，在王朝末年的动荡中崛起为权臣，分别成为北齐、北周政权的奠基者。东、西魏分裂初期，东魏凭借富庶占据优势，但最终西魏逐渐强盛，北周更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隋朝统一奠定基础。这一逆转，与双方治国策略及北方民族局势密切相关。

二者的差异，首先体现在经济与社会治理上。东魏北齐占据关东富饶之地，却纵容豪强兼并土地。孝孝王《关东风俗传》记载，天保年间官府曾强征民田充公，但后期又将土地赏赐给权贵外戚，导致肥沃土地尽归豪强，普通百姓无田可耕。《通典·食货典》指出，这种状况造成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隋书·食货志》更称隋初山东地区沿袭北齐陋习，逃避劳役与游手好闲者占人口六七成。同时，北齐大兴佛教，寺院不仅占据大量良田，还收容依附人口。此类行为严重削弱了国家财力。

反观西魏北周，宇文泰面对关中经济凋敝的现实，推行均田制分配土地，创建府兵制强化军队，试图凝聚民心。谋臣苏绰提出平均赋税劳役的

政策，意在遏制豪强扩张。据《广弘明集》记载，周武帝灭佛后，原属寺院的土地人口重归国家，使得百姓劳役减轻，税收连年增长，军队日渐强盛。这些举措彻底扭转了两方的实力差距。

政治整合与内部分裂更是推动二者走向不同的结局。北齐始终未能化解解统集团的内部矛盾，其权力结构呈现“胡一汉”“郧城一晋阳”双重对立的局面。《北齐书·神武纪下》记载，权臣侯景曾公开表示：若高王在世，我尚能效忠；若高王不在了，我绝不与鲜卑小儿共事。这个话暴露了统治阶层的分裂隐患。到了北齐后期，文官祖珽利用谣言陷害名将斛律光，史官痛惜此举将领离心，反助敌国复仇。相比之下，西魏北周通过关陇集团融合各方势力，宇文泰及其继任者持续推行改革，保持了统治集团凝聚力。

军事态势转变直接反映了历史结构发生的变化。《北史·斛律光传》记载了一个标志性细节：北齐文宣帝时期，周军因惧怕齐军冬季踏冰渡河进攻，每年都要凿开黄河冰面；但到北齐武成帝时，双方攻守易势，变成齐军凿冰防御周军进攻。这种转变明显体现了双方实力的逆转。

北方游牧势力的消长深刻影响东西战局。北魏分裂后，柔然与东魏结盟压制西魏。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西魏通过联姻与之结盟，而北齐选择支持柔然。《周书·突厥传》记载：552年，突厥灭柔然后，北周联合突厥对抗北齐，形成夹击之势。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理论，恰可解释突厥崛起对北齐灭亡的重要作用。

综上，西魏北周通过土地改革、军政整合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北齐则因土地兼并、内斗不止持续衰弱。加之突厥崛起改变地缘格局，最终推动“东强西弱”形势彻底逆转。这一历史进程也是我们认识北周平齐乃至隋唐统一全国这段历史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

